



无用之用 方为大用

——读《走近世界顶尖科学家》

◆ 陈国强

2007年夏,时任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副院长的我与李泓冰因采访结缘。彼时,她在那篇以我为主角的人物报道中,表达了一个强烈的愿望:希望被迫埋首于题海中的中国孩子,能结识更多以创新和开拓为毕生志业的学者、能听到更多在科学前沿探秘的“侦探故事”,期待借此为将来的中国埋下一点创新的种子……

随后的时间里,我们成了挚友。虽然我与她的专业相差甚远,但是我依然尽力欣赏她的文字,敬佩她“跨场域对话”的表达能力和“锋利与柔软交织”的评论风格。她拒绝形式主义的浮躁,坚守“内容为王”,于细节处见真章。她以“现场抵达”的实践哲学,“真相至上”的职业信仰,“人文关怀”的底层视角,为新闻业保留了一份“无用之用”的清醒——“总有人间一两风,填我十万八千梦”,这份对文字的赤诚,或许正是她穿越喧嚣的最大底气。

当我花甲之年离沪赴琼再创业之时,泓冰也离开《人民日报》的记者岗位,成为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的教师,并被复旦大学2025届本科毕业生评为“我心目中的好老师”。去年,我回上海开会时,泓冰告诉我,她准备组织一群新闻学院年轻学子对话从世界各地飞抵“魔都”参加2024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的顶尖科学家。多美好的事情,我也深信那一定是有趣也更有意义的事情。

由她主编的《走近世界顶尖科学家》(人民日报出版社)一书摆在我的案头,她率领新闻学院的师生与人民日报记者合作推出的这个新闻叙事,仍保有着这份数十年前的希冀——以新闻人的独特视角、以科学叙事的诗性表达与严谨实证的平衡艺术,发掘科学故事中那些闪光的基因,将深

奥的科学探索转化为可触摸的人文故事,用细腻的文字和生动的讲述沉淀成精神养料,播进大众的认知土壤里。与此同时,在客观记录科学事实的同时,始终渗透着对“功利主义科研观”的反思。作者没有直接说教,而是通过科学家的选择与坚守,让读者自行体会——那些看似“不切实际”的坚持,恰恰是人类突破认知边界的动力。这种“润物无声”的情感渗透,比直白的论点更具穿透力,为创新意识的生根发芽滋养一片优渥的文化生态。

《走近世界顶尖科学家》以30余万字访谈,为我们展开了一幅基础科学的“无用之用”全景图。从端粒酶的发现到量子叠加态的捕获,从色觉机制的破解到算法公平的探索,这些看似远离现实的研究,最终都深刻改变了人类生活。正如迈克尔·莱维特所言:“创新需要逆流而上”。今天的无用,可能是明天的大用。“真正的创新,往往始于对‘无用’的热爱。”而这种热爱,正通过作者的笔,传递给每一位读者。在这个追求即时回报的时代,这本书唤醒我们:真正的科学精神,在于有勇气为未知而坚守。当我们看到卡罗尔·格雷德“发现端粒酶那天开心地跳起舞来”的描述时,当我们读到杰瑞米·内森斯“把自己想象成牛顿”的豪情时,我们看到的不仅是科学的魅力,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密码——那些不计功利的探索,那些看似无用的坚持,终将在时间的长河中绽放出璀璨光芒。这或许就是“无用之用,方为大用”的终极意义。

我为泓冰和她的学生们的执着和真诚而感动的同时,更感到欣喜的是在这条试图为社会唤起创新精魂的道路上,她并非一位茕茕孑立的独行侠。泓冰对我说,《走近世界顶尖科学家》中的十篇科学家报道,均由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的在校学生主笔,参与创作的大概有四十人。这个颇具规模的年轻文科团队与智能算法先驱探讨

数据的“价值观”,同机器学习之父辨析“智能”与“思维”的边界,和结构生物学家共解蛋白质折叠的曲折秘境……透过文字,这些新闻学子所展现出的探问前沿科学的好奇心态、追问世界变化的执着姿态、切问人类命运的殷殷情态,让我想起爱因斯坦说过的一句话:“最重要的事情是不要停止提问……”

我想,大概在这一点上,科学人和新闻人的岗位职责有着互通的价值旨归,理工医和文史哲的边界拓展秉承相似的愿景蓝图,科技进步与人文关怀指向共同的精神原点——那个被本书所写科学家们一再强调、被“小记者们”反复书写的“关键词”:“神圣的好奇心”。

这份好奇之所以神圣,是因其伴随人类物种的创生而光临,它是在与自然和他者的长久相处中,因体会和迷恋于宇宙的宏大、和谐、神秘,而萌生出的这样一种冲动:走到更远的未来,看到更大的天地,遇到更多的生命。这种冲动是一种“无用之用”,是所有科学的基础公理,也是所有哲学的根本追问——它被视为“无用”,因其不服务于任何清晰的目的和明确的企图;它又可堪“大用”,因其不为任何“已知”所束缚,任思想漫游银河大荒。它不回答任何具体问题,而更新着文明的维度和尺度。

可以说,作为“无用之用”的神圣好奇,是推动人类进步演化的不竭动能。怀揣着这份好奇心,科学家们走进了探寻真理的幽深殿堂,学生记者们走近了那些思想深邃的鲜活灵魂。同样怀揣着这份好奇心,我打开了《走近世界顶尖科学家》一书——

读罢,我也生出一个强烈的愿望:希望面对本书的读者,也都带上一份纯粹的求知和探索欲望,来沉醉于这阙生动故事与精深思想交织的舞曲中。因为透过这本书,我仿佛看到了一片被科学之光点亮的璀璨星空……

唐宋书法之外的遐想

◆ 孙 颅

中国古代社会,影响最大的时期,说汉唐盛世,也许多少存着争议,单说盛唐,估计多数人赞同。其实,唐代最厉害的岁月,从唐太宗的贞观之治,到安史之乱走下坡路,不过一百二十余年。此后,虽有数次中兴的努力,终究难以扭转逐步下滑的颓势。一百二十余年,在历史长河里不算长,却彪炳显赫,成为世界文明中难以忘怀的记忆。

这篇文字,不讨论唐朝,是关于唐之后宋代的随感。唐垮台以后,与宋之间,还隔着七十余年的大混乱,所谓的五代十国,它的存在,对宋的走向,关系甚大,属于避不开的话题。引发这篇随感的,是两本书法集。邓明先生研习中国书法,半个多世纪,学养深厚,对多种书法传统,具有独到的见解,且勤于实践,不断地挥毫创作。面前装帧雅致的两种书,其一《对话宋徽宗》,其二《走近苏东坡》,是新近收获。关注宋徽宗的学者不少,书写苏东坡更是热门,把这两个题材合二为一,放入一只书盒面世,确为别出心裁。书家与编辑家,用意何在,我只能猜测。不过,我的感慨,在翻阅两本精妙书法的时候,兀自波涛汹涌。

宋代比较好的岁月,属于北宋时期,其实,不算很短,前后约一百六十余年。其中,宋徽宗在位约25年。一个皇帝,对文化情有独钟,经他发现赏识的文化精英,并非个别。他自己也下场了,独创的书法“瘦金体”,在灿若星河的中华书画史上,占据无

可争议的一席之地。至于苏东坡,无须多言,讲他居两宋三百余年文豪之首,赞同者亦不在少数。邓明先生以笔墨追随先贤,同时展现两位大家的书法精髓,我想,那用意不限于书画,是希望后人停下匆忙脚步,回望一千年前,宋代文化耀眼的光芒。

宋代文化星河灿烂,有众多作品、典籍做证;宋代经济、科技领先当时的 world,历史也早有定论;说到城市繁荣发达,能与宋代东京(今开封)、西京(今洛阳)相比者,在那个年代的地球上实属罕见,一幅《清明上河图》长卷,是生动形象的记录写照。比较尴尬之处,盛唐名冠中外,却听不到人说“盛宋”;南宋偏安一隅,不提也罢,北宋的一百几十年,社会大体安泰,又有那么多领先世界的创造力,为甚当不起一个“盛”字?说清楚了,问题不复杂。宋代缺陷,在于军事实力。与北方各民族的战争,屡战屡败,不断地求和岁贡,吃亏无数,面子上丢得厉害。赫赫有名的武将,并不少啊,北宋有杨家将一大帮,南宋有岳飞、辛弃疾等拼死效力,为啥打仗老是输得一塌糊涂?小说演绎,把失败归于投降派的阴谋。那或许是原因之一,绝对不是要害。

唐代军事强盛,与它的制度性安排有关。“节度使”的设立,保证守卫疆域的力量强大,地方上财权军权集中,能迅速对入侵的行为强力反制。古代通信交通落后,没有这样的制度安排,等到遥远的京城调兵遣将,局面已经非常被动。利害得失,是权

衡与选择。“节度使”的制度安排,提升了唐朝的军事力量,却留下军阀割据的隐患。安史之乱,展现了这种隐患的巨大破坏力。这种隐患,不但最后摧毁了唐朝,连唐垮台后的五代十国,地方军阀恶斗七十余年,也是军阀割据的回声。宋朝开国,看到前朝的教训,坚决地压制军阀乱政的可能,“杯酒释兵权”,是著名的歷史瞬间。之后,又采取一系列制度安排,防范地方军事力量的强大,把财权兵权尽可能地集中于开封。唐代导致安史之乱的毛病被消除了,国家的军事基础却同时被削弱。宋朝内部长期安稳,对外的战争,却输得一塌糊涂。得失教训,历史给了我们充分的启示。

本文缘起于书法集的阅读,结尾,还是回到书法上为好。我是外行,说点外行的闲话。宋的书法,说是“尚意”,有别于唐的“尚法”。“尚法”,容易理解,讲规矩而已,笔笔按规矩行走。“尚意”,据说,就是按书写者个性情感发挥。苏东坡的潇洒随意,我想,与他“儒道释”贯通的情怀相关,不拘一格。宋徽宗的“瘦金体”,“尚”何意,则有点难以猜测。联系到宋徽宗在位的年代,已然到了北宋的尾端,北方边境的压力日益增大,国家内外交困,坐在帝王位置上的宋徽宗,心情复杂,可想而知。强打精神,挺起腰杆,精瘦之躯,还得保持风骨,有点藏不住的锋芒。形秀而内刚,是不是“瘦金体”之意?纯属外行放言,读者一笑了之。

去年十月某日,病中的冯骥才先生发来了一段自拍,是他自绘的多帧童年和少年时代的五大道生活漫画。待到了十一月中旬,微信上又跳出先生发来的一页绘图日记——病床上的他蓬头乱发,却面上含笑,正在iPad上“指写”。漫画的上方是一段文字:

◆ 孙玉芳
四个月病中写作《清流》,今日完成。写为抓住精神,写为强化自我,亦为此作本身。然极艰苦,虽然杂乱,有待整理,却是一种自强之表现。

应向自己表示祝贺!

当时的我百感交集,回复先生:

天勤之笔,人文之魂。管底攀蜀道,病中感昆仑。

先生随即坦言:

病中最大的痛苦是精神……为使自己的精神不涣散和崩溃,以写作凝聚自己。此间气力不足,写得不好,还要好好整理。此为我最苦的一次写作。为不失去自己而写作。

这仅是《清流:五大道生活1942—1966》创作背景的一个侧面,令人不觉联想到巴金先生的《病中集》,想到他反复提起的“让生命开花”。《清流》无疑是冯骥才先生的一次“生命的开花”,是他追寻时光的“生命之书”。

《清流》中有一句先生的自白:

对于曾经的我,五大道像一条河道,我的生命像一条清流。

这句话在书的勒口、扉页、正文最后一页和封底,反复出现了四次。这一咏三叹,托物起兴,其实是在提醒人们,《清流》乃是作者的一个人生的隐喻。冯骥才先生喜欢将自己的人生比作一条奔涌千里的江河。在江河这一主题隐喻之下,他先后创作了包括《清流》在内的五部人生自述作品。其中,《无路可逃》(《冰河》)写特殊历史时期冰封般的绝境,《凌汛》写新时期文学不可遏制的春意,《激流中》写时代弄潮儿的高江急峡,《漩涡里》写身在文化漩涡中的陷落与升腾,《清流》则溯回他生命最初的河道,去采撷他人生的原初风景——从那段铺着锦绣、浮光跃金的童年,水波不兴的少年,一直写到曲折波澜的青年。

他此后的生命,流出了五大道,流进了新的河道,但五大道是他江行万里的源头,有“蓝色的清流永久在那里发光”。

《清流》还是一种时间维度的“还乡”。它以清淡活泼而又细腻的笔触,深情回顾了作家人生最初的二十五年——亲人、师友、玩伴、恋人、家世、求学、工作、交游、嗜好、日常生活,五大道街区的街道、建筑、河渠、风物人情……其间虽不乏细节的“深描”,同学少年,百侣曾游,有多少似曾相识,却没有太多的铺陈和叙述,或许如同他的夫子自道,他想表达的只是过往的“一点感觉、一点情境、一点滋味”罢了,然而这“一点”最重要。又或许如同帕乌斯托夫斯基在《金玫瑰》中写到的:

在童年时代和少年时代,世界对我们来说,和成年时代迥然不同。童年时代的太阳要炽热得多,草要茂盛得多,雨要大得多,天空的颜色要深得多,而且觉得每个人都有趣极了。

的确,每个人的童年和少年时代都背面敷粉,自带风华,生发由心,当然无需笔墨来渲染。

“任何文本都不始于零”。读《清流》时不妨联系着冯骥才先生的其他作品,比如散文《花脸》《逛娘娘宫》《歪儿》《画池中物》《哦,中学时代……》《忆小人书》《我的“三级跳”》《河湾没了》《姥姥的花瓶》《闲章》《泰山写生记》,小说《艺术家们》《单筒望远镜》《鹰拳》,等等。这些文字和《清流》是“互文”的,它们彼此缠绕,相互映衬,要么呈现出同一人、事、物、景的丰富面像,要么氤氲着同样的天津地方感,又或者透露出某些发生学意义上的写作秘密,寓意现实和想象的某种隐秘的联系……

莫里亚克说:“差不多所有作品都会逝去,但作家却永存。”读《清流》,遇见一个老作家,聆听他最深情的人生白白,细嗅他记忆花园深处的那脉花香。

『让生命开花』